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黄书光

摘要: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亲历者,成仿吾通过长期不懈的多样化办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教育实践,注重“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努力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置身于中国社会剧变,长期倾情于教育实践变革的深层理论求索,彰显出教育家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成仿吾;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514

收稿日期:2023-1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2022 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基础教育迈向高质量历史变革中‘典型经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2JJD88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书光,男,福建福清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E-mail: sghuang@dedu.ecnu.edu.cn。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琅塘乡澧溪村的一个乡绅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家风家教、传统的私塾熏染和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洗礼,一度跟随大哥成邵吾东渡日本,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冈上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除自觉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郭沫若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投身文学革命事业。1924年后,曾受聘为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德语教授。之后,他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身份转变,并留学法国、德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1年夏回国后,担任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1934年4月,调任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同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1月,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命为陕北公学校长,此后又相继参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实际办学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和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84年5月17日辞世。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到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漫长过程中,成仿吾通过多样化本土办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审时度势,坚持以崇高的革命信念、坚定的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维教育实践,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高校的教育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并积极探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脉动与育人方向。他一生穿梭于“文学”、“革命”和“教育”的三重世界,不仅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和革命家,更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特定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维教育实践

与文学上的“革命文学”观相呼应,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逐渐成长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无论身处何等艰难的战时环境,他始终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参与和推进各种类型的多维教育实践,注重“遵循马

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分析、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①。

1931年11月,成仿吾受命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他主持起草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该《决议案(草案)》呼吁工农劳苦群众要拿起文化教育“这个武器”,“来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强调劳苦群众在得到经济政治解放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完全解放。我们必须从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奴隶文化中解放出来,首先要读书识字,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增加我们斗争的力量,来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②。

针对既往文化工作的错误做法,“把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也做得不很好),而放弃了对于红军、赤卫军、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基本群众普遍地施行社会教育,特别是没有广泛地发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该《决议案(草案)》要求,苏维埃文化工作要加紧重心转变,“应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有力的推动者”,强调“要用宣传教育的方法去打破群众中的‘不识字便是真正工农分子了’的不正确的观念,要使每一个工农分子自动来参加识字运动……要一村一村地建立识字班”,并在识字的基础上,加大工农演讲所的工作力度,“要不断改变每次演讲的材料和内容,要按时间性将各种政治问题和苏维埃的策略和各种决议,输入他们的头脑,特别是要将红军胜利和其他革命消息告诉他们,提高他们的精神与战斗的勇气”,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情操;在识字课程初步完成以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将识字较多的(一二百字的)识字班的学生转入工余学校,这就是说在识字课程外新添别的课程,可以增加算术、政治常识、写字、唱歌等几门功课”。与社会文化教育相呼应,该《决议案(草案)》要求,学校教育“并不是说可以放松……相反地,更应加紧工作”,并且还要聚焦中心问题,不仅要每村设立列宁小学,“普遍地发展乡学,使我们苏区里每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读书的机会”;而且要通过列宁模范小学和列宁高小,“培养苏维埃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针对当时鄂豫皖苏区所处的特殊环境,无论是社会文化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战火中”的革命信念和政治需要,该《决议案(草案)》强调指出:“学校是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一个最有力的支柱,在目前学校对于社会文化教育更要特别注意,学生公社要以发动社会文化教育为他们的中心工作,最低限度要组织识字班、新剧小组和化装演讲队,并要经常组织宣传队,担任各种文化上政治上的宣传工作。”^③

1934年4月,成仿吾奉命来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担任专职教员和高级班班主任。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成仿吾见证了“中央党校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的艰难困苦。党校开班初期,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同志都来讲过课,后来战势紧张就很难做到。成仿吾回忆道,“我到党校时,第五次反‘围剿’正紧张进行,中央领导已不能来讲课了。教员只有我一个人……学员没有课本,学习全靠听、记和讨论。形势好,就在教室里讲课;形势一紧张,就要上山钻树林子,头上戴着草编的伪装帽,随时准备转移,一边还要听课记笔记”。在瓦窑堡恢复党校时,“课程安排得多了些”;中央党校还一度从瓦窑堡迁到保安,由于众多学员分居陕北各村庄,间隔较远,难于集中,党校教学工作就因地制宜地调整教学方式,“采取‘小先生制’,把班主任们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学员讲”^④。不难看出,战火中的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流动教育智库和革命大熔炉。它不仅形成了“理论学习和实际斗争相联系”的光荣传统,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独特探索,而且切实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员,为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更是奔向延安,寻找救国之道。党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邵式平为教务长、周纯全为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袁福清为总务长,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边区政府拨款一千八百元开办费。早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之前的一周,毛泽东即为该校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

①成仿吾《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论述辑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页。

③《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9、10、11、13页。

④成仿吾《战火中的中央党校——从瑞金到延安中央党校教学生活片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70—271页。

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对上述“题词”内容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诚如成仿吾所言,“毛主席的报告,给陕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和培养干部的目标。陕北公学一开始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持久抗战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针”^②。

其后,陕北公学的任务即被明确锁定为“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与抗大任务有所不同。成仿吾指出:“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陕北公学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识。”^③

具体而言,陕北公学的学制有两种,普通班学习四个月,高级研究班学习一年。普通班主要学习“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高级研究班比普通班所学课程要多一些、深一些,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来又增加“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些课程,“完全由教员总结自己在过去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结合抗日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进行备课和组织教材。这些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结合,使学员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会了做抗日工作的本领”^④。事实上,陕北公学的学员们除学习理论外,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每星期三规定为救亡日,有计划地进行各种救亡活动,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来,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⑤。

陕北公学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有的学员在学校中只训练短暂的两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但“它能够及时地配合抗战形势的每一个重要变动而变动自己的教育计划。比如敌后方民众运动需要大批干部的时候,它立即把培养敌后方民运干部的任务提高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变动了教育计划,并且动员了成千的毕业同学到敌人后方去”^⑥。1938年10月,成仿吾在《毕业上前线》的歌词中写道:“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⑦正是这昂扬的歌声牵引着每一个学员的赤子报国之心,激荡着全面抗战时期华夏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1939年5月,成仿吾写道,在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陕北公学“培养了约六千多个抗战干部,分发在全国的各方面,特别敌人的后方”^⑧。陕北公学的办学事迹,确实印证了毛泽东的殷切期望:“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⑨

1939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根据抗战需要,决定将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任命成仿吾担任校长,开赴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和抗战活动。学校下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和青年部,原陕北公学被改编为社会科学部,其他各部也是由原学校改编而成。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典礼上勉励大家,“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⑩。由于是到敌后办学,华北联合大学的军事化作风十分明显,“团结、前进、刻苦、坚定”就是其校风,“上课多数是在老乡的打麦场上或其他空场地,或者河滩上,树林里,山坡上;

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②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③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19—20页。

④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2页。

⑤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7页。

⑥成仿吾《陕北公学的新阶段》,《解放》1939年第72期,第17—18页。

⑦成仿吾作词、吕驥作曲《毕业上前线》,《自由中国》1938年创刊号,第2页。

⑧成仿吾《陕北公学的新阶段》,《解放》1939年第72期,第17页。

⑨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77页。

⑩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85页。

课代表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着就讲。学生则是以背包为凳子,膝盖上放一个硬书夹或小木板为桌子,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勤奋地记笔记。学习方法是自学为主,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学和开展生动活泼的讨论”^①。

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环境非常艰苦,但其教育目标明确,特点鲜明,效果显著。其目标是“为革命实际斗争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突出“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懂得党和毛主席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能够解决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能扎根群众之中,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②。仅抗战时期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六年的时间里就毕业了学生 8000 余人,“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者二千多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本校各院的研究室也培养出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教育、政法、财经方面的骨干教师。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解放区,对坚持华北抗战,对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战线的工作都作出了贡献”^③。

二 注重“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培养新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该年 12 月 16 日“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④,任命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胡锡奎为副校长。在次年 10 月 3 日的开学典礼上,刘少奇殷切希望这所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能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快地办好学校。

成仿吾赞成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国策,特别强调学习时要“结合中国情况”。1952 年 6 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中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带有普遍的指导作用的,我们要结合我国情况学习苏联经验。这已经再一次为我们的毕业学生的实践所证明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会苏联的经验,使它与中国情况恰当地结合,才能够办好学校,培养出优秀的干部。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⑤

为了使“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成仿吾认为,要大量翻译苏联名著,也要让来华的苏联专家更多地了解中国,主张学校教育要聚焦新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说:“必须大量翻译苏联名著,必须有计划地向苏联教授介绍中国情况,以便他们讲授苏联先进经验能够更好地注意到中国实际情况。必须有计划地组织教员与研究生的生产实习和其他的实际活动……要引导学生分析中国情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⑥同时他还提出,要突显教材讲义中的中国元素,加快建设“中国化的讲义”。他说:“目前编写中国部分讲义的工作(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工作)应大力进行,因为必须如此才能够逐渐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真正结合起来,并使学生领会如何实现这一结合。同时这样把中国情况加以概括,才能够替将来中国化的讲义——真正自己的各种专门科学著作,打下巩固的基础……应进一步充实中国情况的知识,争取讲义中的中国部分逐渐地占更多的时数,并提高其质量。”^⑦

1952 年 10 月,成仿吾受命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即发现学校在如何有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成仿吾说:“我一来到学校就感到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理解是片面的。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不够……政治教育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不妥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新型大学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讲马列主义了。”为此,他提出了多条切实可行的办学建议。其中第一条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不只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成果,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特别要学习他们教育工作的总精神。”特别是

①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 110 页。

②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 109 页。

③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 142—143 页。

④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 202 页。

⑤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 57 页。

⑥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 58—59 页。

⑦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 59 页。

师范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强调要结合中国“师范大学的特点”而办学。他说：“什么是师范大学的特点……我理解至少包括：联系中学实际，研究教育科学，一切按教育科学办事。所以我们师范大学一定要加强教育实习，一次不行，要搞两次，时间短了也不行，要成立实习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领导这件工作。不仅要开共同教育学、心理学，还要开共同教育史课。各系还要成立教学法教研室，要学习和研究教学法。要在教师和学生中广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在成仿吾看来，学校办学还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自主培养，不能坐等外来专家名流的恩赐。他说：“有些人认为我校目前没有条件培养研究生，这是不对的。我校没有苏联专家和名流学者，也可以培养研究生。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力更生，不能坐等。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培养，一方面还要帮助别人培养……研究部要马上成立，要设研究生科、科学研究科和翻译科。”^①

东北师范大学在成仿吾校长领导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其“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办学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自1952年9月以来的三年中，全校共翻译苏联教材共69种，自编讲义有133种。成仿吾肯定道：教师们“在教科书采用及讲义编写工作上一般能注意学习苏联，主动吸取先进科学成果，注意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并一般能注意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些能结合学生实际知识水平适当配置教材分量”^②。同时他也尖锐指出：“采用苏联教科书有照本宣读现象；自编讲义的科学性、思想性有待提高。这些讲义对科学知识阐明不深不透，尚未能全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联系中国实际、中学实际及适应学生现有知识水平等方面还存在问题。”^③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成仿吾强调除了要创造性地学习苏联教材外，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学术视野和恪守文化自信，注意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和祖国的优秀科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好教材。他说：“在学习使用苏联教材中间，应强调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并随时增加最新科学成就的内容及祖国科学的成就，做到创造性的学习与使用。如条件允许，应在使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及祖国的科学遗产，编写切合中国实际的教材。”^④

三 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⑤成仿吾对此深信不疑，引为至理。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很早就认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⑥在成仿吾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本来是结合的，有了阶级以后，教育同生产劳动逐渐分了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要被消灭，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又必须结合起来”^⑦。

但在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存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应该如何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时代化回应。成仿吾认为，教育理论问题的求索，还是要回到社会存在的实际境遇中进行考察。他说：“人民生活既然非常困难，就不仅成年人终日忙生产，就连儿童也必须参加生产，教育如果不同生产结合，事实上也很难坚持。人民是需要教育的，他们需要学习革命道理与文化知识，但他们既没有教师，又忙于生产。所以，老解放区自开始恢复教育的时候起，就动员与组织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提倡生产教育，这对于打破旧型正规化思想也起了好的作用。”^⑧

早在1931年，成仿吾主持起草《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就特别论及“教育生产化”问

① 成仿吾《关于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在东北师范大学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9—72页。

②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4—85页。

③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4页。

④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5页。

⑤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7页。

⑥ 成仿吾《高等教育十年的辉煌成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7页。

⑦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5—126页。

⑧ 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2页。

题。该《决议案(草案)》指出:“教育生产化是我们列宁小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乡学,我们为得发展乡村的生产,解决劳苦农民的生活以及代耕问题,对于学生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是不应阻止的。我们不但不应阻止,而且还要加紧对于学生参加生产的训练,每天得拿出一两点钟使学生学习养猪养鸡、种瓜种菜等。”^①后来,成仿吾在创办陕北公学时,更突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价值。他指出:“陕公培养的学生为抗战服务,将来到敌后去工作,主要是农村环境、战争环境,不仅要能文能武,还要会劳动,和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打成一片。而我们的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大城市,缺乏劳动的锻炼,更缺乏劳动人民的气质。因此劳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学习生产知识,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掉了学生腔。”^②陕北公学建校初期,给新学员每人发一把镢头,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住宿,挖窑洞就是新学员的第一课。1939年春,成仿吾曾带领全校师生在何家山劳动20多天,开荒21亩,种粮1000多亩,种菜400多亩。一时间,延安青年学生的“大生产运动”被传为佳话,《生产大合唱》也一度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流行歌曲。

不仅普通教育、干部教育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解放区的成人教育同样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仿吾说:“在成人教育方面,老解放区曾经普遍流行过识字班、冬学与民校等形式,都是用各种方式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许多识字班曾经是直接由生产组织带起来的。如做鞋组识字班、纺织组识字班、拨工组识字班、运输队识字班等。”^③

老解放区在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不同领域所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经验,使成仿吾确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可能的”,同时也让他相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发展了生产,也发展了教育,即使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教育有了更好的效果。老解放区生产发展,人民觉悟高,成为全国的模范,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分不开的”^④。

如果说老解放区所倡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彰显的是教育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战争环境中实际的经济需要和政治追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迈向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秉承初心,将马克思对未来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进行更加具体化的时代表达,并付诸火热的新社会实践。成仿吾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教育方针,把生产劳动同教学与体操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把它实行起来,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具体化,并且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正确的发展。”^⑤

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⑦很显然,这些更具体的表述突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理的辉煌的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⑧。成仿吾阐述道:“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列宁对于‘未来的教育’的主要要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新的更明确的提法,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再一次指出了生产劳动的决定的意义。”在他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密切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纾解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更有利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他说:“可以断言,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我国将会提前实现共产主义。”^⑨

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学习、科研和劳动的关系。成仿吾指出:

①《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页。

②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36—37页。

③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4页。

④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5页。

⑤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25—226页。

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3版。

⑦《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11页。

⑧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31页。

⑨成仿吾《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光明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5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做工作要有节奏，就象奏乐一样。我们要有学习、研究、劳动，也要有文娱、体育、卫生……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应该以学习为中心，把劳动与科学研究适当安排。还要有体育、文娱和卫生，不要忽视体育，体育要经常化、文化娱乐也要搞，做到身心愉快。”^①同时，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培养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学习一些生产技能，逐渐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②。

四 倡行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

成仿吾通过长期的办学实践，颇能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形成了别具一格和学校变革观。

其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校变革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为抗日救国而创立的陕北公学即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不仅其普通班课程安排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运动”，其高级班更直接开设“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史”等政治课程。革命根据地突出政治课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在《华北联大的任务与工作》中，成仿吾主张“用革命的理论把他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③。

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成仿吾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在整个教学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素养是新中国大学生不可缺少的必备品格，并为此设立了四门政治理论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特别指出：“由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寻章摘句和咬文嚼字，因此必须引导学生正确地运用这个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固然是困难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它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④他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我们对待工作不应该持主观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态度，而应该辩证地对待工作。”^⑤成仿吾后来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同样十分重视此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其二，注重基层组织创新，夯实学校制度建构中的“教研室”堡垒。

成仿吾在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过程中注意到苏联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基层组织，他说：“苏联先进的教育科学创造了一套这样的组织，一个完整的机构，我们把他翻译为教研室。他把教师们按课程组织起来直接进行有关的教学与研究。”^⑥这一基层组织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突破了散漫的个人主义，凸显了有组织的集体合作智慧，有助于推进新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他指出：“教研室组织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优越性就在于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高度的思想性与创造性的集体。它使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使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紧密地结合，使之完全适合于国家政策与国家建设实际的要求，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⑦

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建立了41个教研室，在教学、科研和师资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仿吾说：“我们一年来的体验证明了，教研室这样的组织是新式高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⑧为了更好地发挥教研室工作效能，他还特别建议“作为前线指挥员”的教研室主任务必全面、经常和主动地抓好工作，强调在工作进行中“要有独创性，有独创精神。因为在工作中会不断发生新的事物、新的需要，就要创造性地进行工作”^⑨。

其三，强化学风和师德建设，推进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成仿吾认为，学风问题不只是一般的思想方法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重大问题。他说：

① 成仿吾《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山东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08页。

② 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29—230页。

③ 成仿吾《华北联大的任务与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页。

④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9页。

⑤ 成仿吾《了解情况，钻研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1页。

⑥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第11页。

⑦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9—210页。

⑧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第12页。

⑨ 成仿吾《努力做好教研室工作（在山东大学教研室主任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86页。

“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治学态度问题,是工作态度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材的问题。”^①在他看来,一所学校拥有什么样的学风,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办好学校的关键。首先,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成仿吾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我们树立新学风最主要的方面……苏联十月革命是从城市开始,我们却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做法,机械搬运外国经验,中国的革命就不可能胜利。”^②那么,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呢?他指出,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尤为传神,关键就是要注重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对今天来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能关起门来不管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要时刻不忘记把我们所学的东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去。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事物的规律性,来提高和发展我们所学的理论,使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有用。”^③其次,要注重独创精神和独立思考。成仿吾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这种独创精神……当然,我们所说的敢想敢干,不是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和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蛮干,而是按照事物本身的面目去认识客观世界,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样才是正确的独立思考,才是真正的独创精神。”^④在这里,他特别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强调要以辩证统一的思维直面客观事物。他说:“我们不能片面地对待事物,应该掌握各种事物的矛盾统一,做认真地分析,不能看到这一面就忘了那一面,一定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⑤第三,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仿吾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助于思想解放、社会改良和个人进步,而且有助于摒弃“庸俗的师生关系”,建立真正同志式的“革命的师生关系”。1959年7月,他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道:“在我们学校里面,这种批评也应该是同志式的、平等的、民主的批评,是与人友善的批评。我们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同志式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庸俗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师生关系。”^⑥此外,成仿吾还强调,我们要“学到真正的本领”,“要在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刻苦钻研”^⑦。

与注重学风问题相契合,成仿吾亦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就是要“为人师表”,不只是教书匠,要又红又专,要善于弘扬中国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他说:“我们要培养人民教师,不是教书匠,只是专,教教课,不能称为人民教师,只能是教书匠……教师首先要为人师表,在学生面前起表率作用;还应在红的方面,帮助学生提高,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中国教育有好传统,重视道德教育,教师教给学生一些知识,同时使他懂得道德,应把这个传统继承发扬。”^⑧在他看来,教师是以育人为志业,教师要想让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生动活泼的主动发展,就要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作出努力。他强调,教师不仅要树立“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而努力教好”的崇高精神,而且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又红又专,培养学生又红又专,教师也要又红又专。二是要善于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三是会做学生工作,这就要深入调查,分析情况。要教学民主,向学生学习……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并以身作则,带动学生”^⑨。作为负责任的优秀教师和校长,成仿吾备受学生们的爱戴,被他们亲切地称作“成妈妈”。曾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戈华学生回忆说:1939年初,成仿吾校长“亲自给我们十一队讲解《共产党宣言》,不论同学们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非常耐心的给予解答,直到弄懂为止,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⑩。

五 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

1978年7月,成仿吾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与副校长郭影秋一起负责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八年后的复校工作。在复校大会上,他明确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

① 成仿吾《毛泽东教育思想简述》,《新论语》1960年第4期,第11页。

②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7—128页。

③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8—129页。

④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9页。

⑤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0页。

⑥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1页。

⑦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2页。

⑧ 成仿吾《关于教师的培养和提高问题(在山东大学教师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79页。

⑨ 成仿吾《要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在山东大学教师和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36页。

⑩ 戈华《敬爱的成校长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成仿吾校长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成仿吾校长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培养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①。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相适应,成仿吾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任务,是如何使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②具体而言,他强调中国人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学校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建设起来的”^③,理应继承和弘扬本校源远流长的优良办学传统,务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教学和科研都要更紧密地结合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探讨,以新的材料、新的思想充实教学与科研内容,提高质量,以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④。

成仿吾深知,现代化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参与和支撑,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与优秀人才的获得都离不开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坚实基础。他说:“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不管哪条战线,要搞现代化,都必须有现代化的人才。而人才从哪里来?毫无疑问,都需要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部门来培养。因此,教育和四个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其他部门的现代化。”^⑤

在这里,成仿吾对现代化、教育与人才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并突出“人”在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核心价值。

办怎样的“教育”和学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成仿吾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激发革命精神,采取革命措施,善于“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培养出大批人才”^⑥。在和平建设年代,则要求通过创办“高水平的教育”,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实质发展和各类人才的不断涌现。他说:“为了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一切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又都必须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懂得新时期的政治学、法学、人才学,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⑦

而要实现“高水平的教育”,则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固化思维,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现代化变革的高水平发展。他说:“思想要不断解放,教育才能不断提高。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⑨没有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战略构建,就不可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高质量的教育现代化体系,同样无法培养出大批创造性人才,更谈不上建成创新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仿吾所聚力阐发的“高水平教育”、“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技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支持,以及“高水平教育”对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引领,这些透析出真知灼见的理论思考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论“教育、科技、人才”之整体建构确有相合之处,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后继者不乏启迪之功。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43页。

②成仿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51—252页。

③成仿吾《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1页。

④成仿吾《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3页。

⑤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6页。

⑥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7页。

⑦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8页。

⑧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8页。

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